

论“技术之思”的三条路径 ——兼议马克思技术批判的超越性

付文军

摘要: 技术作为与人息息相关的“事件”而备受关注。在对技术范畴的考察中,有三条值得关注的解释路线。一是以实证思维对技术的工具论阐释,它秉承了“工具主义”的传统、以“价值中性”为旗号、以“实证经验”为方法,最终落入到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之中。二是以思辨抽象原则深掘技术的原罪,它着重以“后果”为参照,抹除技术与周遭环境、主体状况等的关联并对其进行理论抽象和思辨考察,继而深掘技术的“原罪”属性和对技术展开“浪漫主义”的抽象诠释。这两种阐释模式都只是对技术范畴的单向度阐释。三是马克思所开创的技术批判论,他直面技术这一“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本身,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叙事中科学地揭示了技术的物质形态和社会形态,并确证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后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人类社会的高度上阐发了技术的善用与自由王国的达至问题。作为一种深层的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论为现时代的正视、善用技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 技术范畴; 实证思维; 抽象思辨; 唯物史观; 自由王国

中图分类号: A811.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1)06-0010-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6.002

技术是一个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联的存在,对于技术的思考与诠释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在对技术社会效应的评判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思维模式:一种是将技术视为单纯的“工具”而对其展开实证分析,另一种则是深掘技术的“原罪”而对其展开抽象否定。无疑,这两种阐释模式都只是片面地夸大了技术的“某一个侧面”而陷入到了对技术单向度阐释的窠臼当中。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引,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展开了对技术范畴的辩证审视^[1],继而开辟了对技术范畴诠释的科学性进路。

一、“技术工具论”:技术中心主义的实证阐释

在对技术问题的诠释中,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曾是一种“流行的”阐释方式^{[2](P68)},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皮特(Joseph Pitt)、肖(William H. Shaw)和芬伯格(Andrew Feenberg)都是这一立场的拥趸。技术工具论即在工具论(工具主义)视角之下论技术及其相关问题,其核心要旨在于将技术视为单纯的工具性存在。更为确切地说,技术工具论主张将技术视为与价值无涉、与社会无关的存在,继而强调技术只是服务、服从于使用者的一种中性工具或手段而已。在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社会哲学思想研究”(21CKS030)

作者简介: 付文军,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fuwenjunzuel@126.com (浙江 杭州 310058)

人类技术阐释史上，技术工具论先后历经了个体工具论、阶级工具论和抽象工具论的历史演变而广为人知。当然，技术工具论的兴起是有传统、有旗号、有方法和有根据的。

首先，技术工具论秉承了“工具主义”的传统。技术工具论主要延承了两大传统，一方面是自古希腊以来的朴素技术论的赓续，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科学传统的接洽。就前者而言，希腊先哲（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就开始反思技术（或工具）的相关问题，并著成了《工具论》（Organon）。在他们看来，技术（或工具）绝非目的，而仅仅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工具面前具有天然的“优先性”。这是对人和自然、目的和手段关系的朴素主义解释，为人类提供便利和资源的自然并不能自动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就需要借助于技术以达成对自然的“模仿”和“超越”。“技术活动中存在着客观的、中性的内容，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3]就后者而论，自然科学在近代得到了大发展，近代实验自然科学不再纠结于对形式、质料等问题的探讨，而以自然现象为对象并探究其间的基本规律。近代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基础，以自然主义、工具主义为价值取向，以经验观察和形而上学为分析法则，继而求得确定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使得人们的研究和思考有意无意地陷入到工具主义思维的泥沼之中了。这种思维模式就是技术工具论根深蒂固的思想渊源所在。

其次，技术工具论以“价值中性”为旗号。技术工具论主张价值中性，以中性立场自居。技术工具论者将技术仅仅视为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手段，技术的存在、使用与其社会效应、后果并无关联，技术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技术就是技术，无论外部环境和客观因素如何，都不能改变其中性特质。技术工具论以“价值中性”为旗号，发出了“目的与手段的截然二分”^{[4]（P9）}“技术自身非善非恶”^[5]“技术是一种可被善用和坏用的被动性工具（Passive Tool）”^[6]“至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达到何种目的，这都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7]（P60）}的论断。在技术阐释史上，雅斯贝斯对于技术所秉承的价值中性的论说最为透彻，“技术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但它既能用于善也能用于恶。它本身不包含任何思想，既无尽善尽美的思想，也无毁灭的恶魔般的思想。二者皆来自人类中的另一些根源，人类赋予技术以意义”^{[8]（P132）}。技术工具论者预设了价值和工具的分离和对立，有意剥离掉技术所附着的人文-价值属性，刻意强调技术的客观-工具属性。究其实，这种有意的剥离是一种还原论的处理模式和静态的认知观，技术被还原为与人无涉的存在物。

再次，技术工具论以“实证经验”为基本方法。对技术的实证主义审视和经验主义考察是技术工具论者所采用的常规方法，也即直面技术并对其展开直观理解。实证主义的分析范式有其合理之处，“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9]（P524）}。对于技术的实证经验式考究，既可以明确技术之为技术的前提条件，又可以对技术的物质属性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知。因此，技术工具论者以实证范式来观察技术并力图直观展示技术这一“可观测的客观世界”，它依托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科学实验和数理计量为工具而竭力探寻技术背后的真相。如此，我们很容易洞察到技术所适用的范围、领域、形式和载体，一些与技术相关的原料、工具、规范、指标、设备和工艺等也都得到了最为直观的表达。诚如马克思所言，“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9]（P528）}。可以说，技术工具论所坚持的实证主义方法有助于人们对技术之表象的清晰理解和认知，其回到技术本身的做法也有可取之处。

最后，技术工具论以“技术决定论”为理论结局。技术工具论的理论主张也终将滑向“技术中心主义”（Technological Centrism）或“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既然技术与价值无涉而具有自主性，不断发展的技术就在历史中不断塑造着人与人类社会，“一旦某种主导性的技术被引入到社会中，相应的社会体系就要屈从于技术律令”^[3]。技术工具论滑向技术决定论就不可避免了。这一观点充分强调技术及其变革的首要社会效应，即认为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变迁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技术决定论在理论演进中既存在“强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乃社会演进

的充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和“弱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乃社会变迁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技术源于并反作用于社会）^[10]之分，也存在乐观主义（对技术的社会价值及其发展前景持乐观或肯定态度，认为技术能够化解一切矛盾和问题并给予人幸福）和悲观主义（对技术的社会价值与发展前景的悲观或否定态度，认为技术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和摧毁）之别。可以说，技术决定论作为技术工具论的必然结局是对技术的充分肯定或充分否定，技术也被赋予了一种自主性的“神力”，它逐渐渗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并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可见，技术工具论是对技术的实证主义阐释。秉承技术的自主性原则，技术工具论将技术与技术的“致用”、技术与价值、技术与后果之间截然分离开来，继而鼓吹技术无需为问题负责的论调。“技术仅只是生产工具，技术自身具有独立性的价值；技术自身就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与技术的社会形式和使用方式无关；技术理性的运用，不但可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解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切矛盾；技术理性是洁白无瑕的天使，它可以在人间建立起天堂，它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人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对技术及其发展进行价值评价和哲学反思。”^[11]显然，这一阐释方式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它强调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技术，它至多只能完成对技术及其相关问题的粗浅勾勒。究其实，技术工具论的实证阐释方式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不彻底的诠释模式。

二、“技术原罪论”：技术浪漫主义的抽象阐释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技术的体认与感悟也日渐加深。尤其是受困于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道德滑坡、传统消失和贫富分化等问题，部分学者开始号召对技术的本质及其后果进行前提性反思。技术原罪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它将宗教的原罪说套用到对技术的评判之上，继而强调技术生而有罪。

首先，技术原罪论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驾驭自然和改造世界的技术得到了大大增强。作为“在世之在”的人自负于拥有现代科学技术而显得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然而，随着人与自然之间交流的深入和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凸显，一系列与人和技术相关的问题都纷纷出现了。尤其是随着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和米都斯（Donella 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的出版，原本一些被遮蔽的问题（如DDT等有机农药的大量使用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人类未来发展和增长的极限问题）广泛进入到大众视野。加之现实生活中的技术滥用而导致的诸多人与自然的危机、人与人的社会危机、人与精神的危机等日渐凸显，部分学者开始从技术的喜悦中脱身而出，开始思考技术与其滥用后果之间的关联。在对技术的产生、技术的效用等问题的审思之后，这部分学者开始聚焦于技术的来源和技术本身来探究技术与人类发展的问题。简而言之，部分学者在有感于技术给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创伤之后，深入反思了技术的历史与本质，并指认了技术所带有的原罪是造成这些困境的祸首。

其次，技术原罪论着重以“后果”论技术。技术原罪论面向技术、面向技术带来的问题，继而按照一定的因果逻辑推导出技术自身所带有原罪并将这种原罪归结为技术之所以呈现负面效应的唯一或关键因素。虽然不能轻易地将技术原罪论归结为“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或“本质论”（Essentialism），但我们从技术原罪论的逻辑理路中可以窥见这一理论的实质：它貌似是要通过对技术的追根溯源而深究技术所带有的原罪本质，实则是以技术的负面效应和社会难题为聚焦点而展开对技术的一种阐释方式。与其说技术原罪论秉持了“本质论”的思路，毋宁说它更侧重于技术所带来的“后果”，由“后果”而直接“溯源”。显然，这种“由果溯因”的方式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然而也存在忽视原因和结果之间过程的明显缺陷。换而言之，技术原罪论的这种“因果观”实

实际上是简单、直接的因果观，更近似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再次，技术原罪论奉行抽象思辨分析范式。随着技术原罪论频频亮相，人们对于这一论调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诚如前文所言，技术原罪论“由果溯因”推断的思维方式，它将技术的诸多恶劣后果都归结为技术自身所带有的原罪，继而对技术进行判量。其实，技术原罪论所透露出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思维和抽象思辨，它割裂了技术与人、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的思维、技术与技术之间复杂的关联。在清理掉笼盖在技术之上的复杂关系之后，技术及其后果之间的逻辑就无比清晰了，所有后果都是由于技术自身所致。在不断的“退思”中，技术的原罪就被挖掘了出来。既然技术是带有原罪的，技术进步必然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人类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放弃技术，退回到蒙昧和野蛮时代。在此意义上，技术堪称是一个十足的“野蛮主义者”，技术压抑生命、阻碍进步、践踏文明，因此只能允许它发展到最低级的阶段。由是观之，技术原罪论的抽象分析范式容易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困境当中。技术原罪论者聚焦于技术及其后果，只看到了技术的物质-现象层级，而不能洞察技术背后的关系-本质层级。

最后，技术原罪论在当代有多种表现形式。在技术原罪论者看来，技术作为一种物化（或对象化）的存在，其内部蕴藏着“潜在的危害性”，以至于在“技术空前发达的当代社会，这种危害性外化后日益膨胀，甚至到了人类很难控制的地步”^[12]。具体说来，技术原罪及其社会后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加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技术还不够发达，“矿山还很少被利用，铁、铜和锡还相当平静地埋在地下”^{[9](P97)}。人和自然之间虽然有冲突和对立，但是并不尖锐。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遍地、土地荒漠化和沙灾、水土流失、旱灾和水灾、生物多样性破坏、生物基因安全等问题频频出现，这无不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失衡的直接、突出的表现。二是技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技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人”（Homo Faber）凌驾于现代人（Homo Sapiens）之上^{[13](PXiii)}，作为人造物的技术（技术人工物）却反过来制约人的存在与发展。“技术曾被广泛用于非人类领域，现在却使人自身也成了技术的作用对象了。”^{[13](PXiii)}技术虽在行为控制、基因改造等方面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有着莫大帮助，但技术理性的泛滥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冷漠和隔阂等社会问题。三是技术引发了人与自身精神之间的混乱状况。精神由物质所决定，精神附着于人自身。随着技术的渗入，人的生物特征和生命特性都受制于技术，不仅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受到了影响。主体的迷失、精神的裂变、情感的缺席逐渐成为技术时代的“顽症”，技术座架之下的“意义丧失”和“无家可归”也成了“常态”。

由此可见，技术原罪论是对技术的抽象主义理解。以技术的后果为参照，抹除技术与周遭环境、主体状况等的关联并对其进行理论抽象和思辨考察，继而深掘技术的原罪属性。“技术具有原罪，它是造成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技术不是带来社会的进步，而是给人带来灾难，给社会带来倒退，认为只有抛弃现代技术才能摆脱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要人们退回到前现代社会的野蛮状态，从而陷入对现代技术抽象的、浪漫化的否定。”^[11]可见，这一阐释模式是对技术的抽象思辨考察。技术原罪论虽然面向了技术本身，却未能完成对技术的科学考究。从根本上说，技术原罪论是对技术及其问题怀有浪漫主义情绪的抽象诠释。

三、“技术批判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

马克思的技术阐释路径是从根本上区别于技术工具主义和技术原罪主义，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技术批判主义路径。当然，这里的批判不仅包含有“拒绝”和“否定”的意涵，还包含“澄清前提、划定界限”^[14]的意思。前者主要是指马克思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和抽象思辨诠释路径的“批判性

拒绝”，后者则指马克思对技术之为技术的“前提性追问”和“深层次反思”。可以说，马克思携其技术批判论的出场既开辟了技术阐释的科学路径又推动技术研究迈向了新的高度和新境界。^①

首先，马克思确证了技术批判的现实基础：“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15](P3)}。马克思是直面现实而进行研究的，他所进行思考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9](P519)}。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技术变革（或转型）的时代，是一个由“蒸汽磨”塑造的“工业资本家的社会”^{[9](P602)}和一个貌似是用“法术”来创造“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16](P37)}。在这样的时代里，“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16](P36)}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技术的“魔力”。马克思在1856年的演说中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5](P3)}。这些都是马克思所言及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技术事实”。面向这些“技术事实”本身，马克思开始了对生理学、天文学、农业化学、工艺学和其他与技术相关知识的关注。经过切身查究，马克思指认了这些“技术事实”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开始将这些“技术事实”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开启了解蔽资本主义的序幕。更为确切地说，马克思是“实践地”考察技术这一范畴的。深入到生产实践这一技术的“母体”及其成长的“沃土”中^{[17](P46-47)}，深掘技术的本体论根源，使得技术的本质规定得到了确证。

其次，马克思指认了技术的双重向度：物质形态和社会形态。技术（Techniko）是属于 techne 的一种存在，它不仅表征着人们的手工行为与技艺，还指向了人们的艺术创造。在对技术的全方位审视中，马克思首先指认了技术的表层形态——作为物质形态的技术。技术要为人所知晓，就要有表达自身的载体。从石锄、石铲、石镰、蚌镰、骨镰、骨耜到青铜器、铁器，再到纺纱机、蒸汽机、电报机、火车、轮船、汽车和无线电，这些东西无不是技术的表征，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技术人工物”。显然，“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18](P102)}。纵观这些“技术人工物”，它们不过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8](P102)}。同时，马克思还深刻指认了技术的本质维度——作为社会关系形态的技术。技术不仅呈现为反映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冰冷之物，在本质上还映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联。技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它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历史性生成。如此看来，技术就与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联，离开人来论技术、离开技术来说人都是无意义的。在我们的认知中，当谈到石器、青铜器和手推磨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联想到前资本主义时代，当论及蒸汽机、电力和大机器

^①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未出版有关“技术”的专著，也未集中研讨“技术史”的相关问题。当然，这绝不是否认马克思技术思想的理由所在。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I版）为检索对象，以“技术”为检索核心词汇，我们可以得到40余条直接相关的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9页。“技术”之所以未频繁地出现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本的翻译问题，“与‘技术’一词相关的英文对应词是 Technique、Technology；德文对应词是 Technik、Technologie；俄文对应词是 техника、технология。前一个词语主要指技艺、技巧、技能、具体操作或专门方法；后一个词语大致指体系化的技术，如工艺、工业技术……在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具体处理上，前一个词多翻译为技术、技能、技巧等，后一个词多翻译为工艺、工艺学、技术研究等。”参见王伯鲁：《马克思技术思想纲要》，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二是由于马克思的行文处理方式问题，“在述说技术现象时使用了众多‘技术’的下位概念”，比如“棉纺品”“手纺机”“手纺车”“蒸汽”“科学”“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等词汇都是“对技术产品、技术设备或技术流程的直接表述”。参见刘大椿、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47页。

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资本主义时代。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些“技术”背后隐匿着的社会关系。更确切地说，这些“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表征，它们“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还“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和“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18](P102)}而存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使得技术本身的社会关系属性更为明显，大机器的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高强度的工程作业等都无不是资本剥削的重要表现，这些“技术”所要表征的就是与资本相关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确认了技术的本质性规定——技术不单单是“物”（或者说技术不仅具有自然属性），更为深刻地，技术还是“关系”（或者说是为物所中介了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

再次，马克思展开了技术批判双重叙事：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技术范畴的批判性考察是沿着“形上”和“形下”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线而展开的，即马克思展开对技术范畴的唯物史观阐释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完成了对技术范畴的宏观审视。马克思始终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9](P520)}技术形态与人们“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是密切相关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开启了对技术的本体论追问——技术乃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历史密切关联的生产方式，它“座架”了人与社会。究其根本，技术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存在方式。当然，马克思还完成了对技术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的预判和梳理。“马克思以现代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区分了三种人类的生活世界类型或形态：前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的‘自然人类生活世界类型’，现代社会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或‘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11]如此，技术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技术的现象和本质等问题都得到了科学回应。就后者来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完成了对技术的微观呈现。对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是与马克思致思思路转变密切相关的。为了解决“苦恼的疑问”，马克思转入了经济学的研究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技术批判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的切入可以实现对技术范畴的微观解剖。马克思从哲学和经济学的双重视角将“技术如何影响物质资料生产、如何影响劳动力自由解放”^[19]科学地内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之中，继而科学地展示了技术与资本增殖、资本积累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是普照之光，一切都要服务、服从于资本，技术也不例外，“技术问题是理解资本运动趋势的基础”^{[20](P167)}。资本与技术的共谋机制——资本的技术化和技术的资本化，实则是围绕资本增殖而展开的。“资本不停地、直接地塑造了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它也是由后者塑造的。”^{[21](P11)}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科学技术能够大规模地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并且还赋予了科学技术新的使命——“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2](P570)}。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为我们呈现了“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技术”和“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技术”^[1]。技术的本质、特征与效应都在政治经济学这一“显微镜”下无所遁形。

最后，马克思阐明了技术批判的理论定位：深层的社会历史批判。通过对技术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后果也愈发凸显——“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3](P267)}的状况得以强化。一方面，技术的广泛应用起到了十分革命的作用。人们借助技术而提升了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生产组织形式的建构^[24]，适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也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技术服务于资本，技术逻辑隶属于资本逻辑，这样的技术必然就会暴露出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在资本逻辑之下，技术的应用越广泛，技术的宰制就会越深重，技术异化——技术为人所用却反过来成了“制人”的手段——也就随之出现。在技术的运作图景中，人的主体性开始模糊。雇佣工人的力量在轰鸣的机器面前显得单薄，机器作业逐渐取代了手工操作。广大工人由工具的“使用者”变成了机器的“服侍者”，不仅如此，工人还作为“活的附属物”而被并入到了“死

机构”之中^{[25](P486)}。长此以往,工人在技术的宰制之下会逐渐丧失自我,并使“人的灵魂物化”^{[26](P22)}。可以说,随着技术的不断渗入,“物的依赖性”会逐渐加深,继而造成社会对技术这一“人工物”的普遍痴迷与崇拜。对此,哈维的判断是准确的,“整个资本主义对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都充满了迷恋”^{[20](P185)}。这种“迷恋”在思维(或意识形态)层面则演化成了技术拜物教。面对技术异化的现实,马克思携其技术批判理论出场也为人类摆脱异化处境提供了思路。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别,技术本身并不带有“原罪”,当代社会所暴露出的与技术相关的棘手的社会难题,实则是技术的使用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问题)。易言之,摆脱技术异化的处境并不是要否定或抛离技术,而是要实现技术的“善用”,“只要对技术运用得当,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定会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技术的善用能直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迈入理想的自由王国”^[1]。可见,马克思不仅从经济基础层面分析了技术及其社会后果,还从意识形态层面深刻阐释了技术异化的现实状况,继而为我们摆脱技术异化而寻求解放之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理论是一种全面的、科学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批判。

在人类技术阐释史上,马克思是独具一格的。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论既克服了技术工具论的实证主义思维,又摆脱了技术原罪论的思辨分析范式,继而确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法则。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洞察世事的“利器”,技术范畴的物质属性、社会本质、运用范围和历史趋向都得以科学界说。马克思技术批判论也告诉我们,技术批判不应演变为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攻击”,而应日渐变为一种“具体的实践事务”^{[27](P23)}。

参考文献

- [1] 付文军.《资本论》与马克思的技术批判[J]. 社会科学辑刊,2019(6).
- [2] Achterhuis, H.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张成岗. 西方技术观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启示[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3(4).
- [4] Feenberg, A. *Questioning Technology*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5] Morrow, D. When technologies make good people do bad things [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4(2).
- [6] Illies, C., A. Meijers. Artefacts without agency [J]. *The Monist*, 2009(3).
- [7] Mesthene, E. G. *Technology Change: 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8] [德]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M]. 魏楚雄, 俞新天,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王伯鲁. 马克思技术决定论思想辨析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7(9).
- [11] 刘日明. 马克思的现代技术之思 [J]. 学术月刊, 2020(4).
- [12] 郑晓松. 技术原罪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6).
- [13] Jonas, H.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14] 吴晓明. 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 [J]. 世界哲学, 2018(1).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7] 刘大椿. 审度: 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 [19]卢江. 马克思技术二重性批判理论研究——基于《资本论》及相关手稿的文本考证[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3).
- [20][美]大卫·哈维. 马克思与《资本论》[M]. 周大昕, 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8.
- [21][加]罗伯特·阿尔布瑞顿. 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M]. 李彬彬, 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24]刘同舫.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劳动正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9).
- [25][德]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 [26][德]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7][美]安德鲁·芬伯格. 可选择的现代性[M]. 陆俊,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Three Paths of “Thinking of Technology”

— On the Transcendence of Marx’s Technical Criticism

FU Wen-jun

Abstract: Technolog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s an “event”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 Three interpretation routes deserve atten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echnical category. The first is the instrumental interpretation of technology by empirical thinking. It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instrumentalism”, takes “value neutrality” as the banner and “empirical experience” as the basic method, finally falling into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he second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peculative abstraction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sin of technology. It focuses on the “consequence” as a reference, era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subject conditions, etc., and conducts theoretical abstract and speculative investigations on it, and then deeply explores the “original sin” of technology and the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of “romanticism” on technology.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 modes are on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chnical category. The third i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itiated by Marx. He faced up to technology, the “great fact characteristic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ealed the material and social forms of technology in the dual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and confirme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On this basis, Marx explained the issue of the good u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attainment of the future free kingdom from the height of human social history. As a deep-leve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paradigm, Marx’s technical criticism provides a scientific methodological guide for us in the modern era to face up to and make good use of technology.

Key words: technical category; empirical thinking; abstract spe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kingdom of freedom

(责任编辑 孙洁)